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of IaH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19

LI Haojin

Zhejiang University

Received: April 22, 2024

Accepted: May 2,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Haojin. (2024).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of IaH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19.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200–20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18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18>

Abstract: The IaH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which is the emerging development mod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scholars recently.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as a catalyst, the IaH demonstrates a progression from slow to fast, scattered to norms, and theory to practice.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aH,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and “weak attracti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build a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based on “Chinese localization” remains unanswered.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COVID-19; development; challeng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I Haojin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新冠前後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與挑戰

李昊錦

浙江大學

摘要:「在地國際化」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興發展模式,近年來受到了國內學者的大量關注。以新冠疫情為轉折點,「在地國際化」呈現了由慢到快、零散到規範、理論到實踐的發展態勢。「在地國際化」迅速發展之下,依然

存在「技術不足」「吸引力偏弱」等諸多挑戰,如何構建基於「中國本土化」、高水平高質量的在地國際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

關鍵詞: 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新冠前後;發展;挑戰

21世紀以來,為順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向,高等教育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成為了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提高中國教育國際化水平」。目前,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已經成為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隨著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發,傳統空間意義上的「跨境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 IA)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國與國之間的跨境交流受到了諸多不可抗力因素的阻礙。在此情況下,「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aH)作為與「跨境國際化」並行的國際化模式^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以及國際化實施的重要導向之一。

為進一步推動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助力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在地國際化」已經受到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早在疫情暴發前,學者張偉、劉保存已經指出,我國具備開展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基礎條件,強調「在地國際化」戰略是我國高等教育全面國際化的必然選擇^②;後疫情時代,學者蔡永蓮、仲彥鵬認為「在地國際化」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途徑^③和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新路向^④,且亟待深化研究。同時,部分學者指出我國「在地國際化」仍面臨國際化師資偏弱、評價體系功利化^⑤等諸多挑戰,學者李偉、張健偉對歐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共性要素進行歸納後,認為我國「在地國際化」需要打破西化從屬觀念、完善學校組織與課程內容^⑥。以新冠疫情為節點,我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進程加快,在課程內容、教學模式、技術賦能等方面得到提升,但依然存在諸多挑戰,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廣、效率高的「在地國際化」模式仍有待探索。

一、「在地國際化」涵義與國外應用

「在地國際化」概念並不興起於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後,最早由瑞典馬爾默大學副校長本特·尼爾森(Bengt Nilsson)於1999年提出。對於其定義,早期德國學者貝恩德·沃切特(Bernd Wachter)認為「在地國際化」是「高等院校中發生的除師生海外流動之外的所有與國際事務相關的教育活動」^⑦;近年來,斯·貝倫(Jos Beelen)和埃爾斯佩思·瓊斯(Elspeth Jones)對既有研究進行了整合,他們認為「在地國際化」是指「高校在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國際性和跨文化維度融入面向全體學生開設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課程之中」^⑧。綜上所述,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在本國內、以國際化多元課程為主、囊括國際學者交流、國際項目、國際會議等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其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國際化事務體驗,在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在地國際化」作為新興概念逐漸演變為全球高等教育新潮流,但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雖然對經濟條件要求較低且受眾面更廣,「在地國際化」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仍然更集中於處於全球知識中心的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早在2013年,歐盟就已經將「在地國際化」正式納入了官方文件^⑨,根據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



數據統計，截至 2015 年，已有 56% 的歐洲大學將「在地國際化」納入學校規劃並實施¹⁰。而那些處於全球知識圈層邊緣或半邊緣的國家難以和中心國家進行平等的知識和學術交流，僅僅充當知識的「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¹¹。以印度為例，2018 年，印度共生國際大學(Symbiosis International Deemed University, SIU)與印度大學協會聯合舉辦了以「在地國際化:建設全球、國際和跨文化(GII)能力的戰略」為主題的國際會議，較早提出了「在地國際化」概念並對其原理進行了闡釋，但並沒有受到政府、社會的普遍關注。直到 2020 年「在地國際化」才正式被寫入印度《國家教育政策 2020》(NEP 2020)¹²，在後續的政策落實中也並沒有緩解印度人才流失的現實困境。

雖然「在地國際化」為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提供了理論可能，但在跨境交流主體地位尚未改變、發達國家掌握知識中心的情況之下，全球範圍內對「在地國際化」的實踐舉措依然受限。

二、疫情前的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中國作為世界上「跨境國際化」規模最大的國家，不可避免地更偏向於跨境國際交流。這一階段，國內高校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已經非常重視：近九成以上的普通本科院校對本校國際化發展有著明確要求並製定了國際化發展戰略目標以及中長期規劃和實施方案¹³。這些措施主要基於國內外師生的訪問交流，側重於打造國際化品牌效應，在而不是注重培養國際化人才，「在地國際化」這一概念也較少提及。

2015 年，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對全國 553 所高校(其中包括 24 所 985 高校、48 所 211 高校)就「國際化發展狀況」進行了調查，並發布了《2015 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報告》。《報告》指出，該時期國內高等院校「在地國際化」的國際化模式基本表現為雙語(非外語類)課程、國外師生來華交流、線上講座、國際會議等非母語交流模式¹⁴。高校「在地國際化」實踐基本體現在課程的語言形式層面，多為外國來華學者或有海外經歷的本校教師採用外語或雙語的形式來進行專業課程的講授。這類課程對學生的提升主要集中在語言交流能力上，對培養國際化人才的作用有限。

此外，《報告》還指出，由於線上課程平臺搭建尚不完善、教育資源不均等原因，受眾群體也比較受限。根據《報告》數據顯示：在國際化管理人員方面，985、211 高校分別平均配置有 32 人、19 人，顯著高於其他高校平均配置(6 人)；在全外語(非外語類)課程設置數量上，985、211 高校平均開設有 205、93 門，其他高校平均僅開設有 29 門，東部地區高校設置的全外語類課程數量(平均 54 門)同樣顯著高於西部地區高校(平均 29 門)¹⁵。由此可見，東部地區、985、211 高校的師生一般更易獲得接觸、了解「國際化」教學模式。不僅如此，在中國本土傳統的「投入—產出取向」(input and output-focused orientation)的教育評估機製下，通過單一的學分、成績來不能較好地反映學生國際化素養，其國際化課程有效性有待商榷。

總體而言，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在地國際化」已經被國內學界所關注，但在實踐層面仍未取得較好落實，至多作為「跨境國際化」的輔助手段。各高校之間的在地國際化活動較為零散，尚未建立規範性的框架基礎，處於從理念到實踐的初步發展階段。

三、後疫情時期的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

新冠疫情暴發後，跨境交流受到了極大阻礙，對全世界範圍內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國際大學協會調查顯示，疫情對 89% 的高等學校中的國際學生流動產生了負面影響^⑥，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與漢斯·德·維特 (Hans de Wit) 在 2020 年指出：「從短期、中期，甚至長期來看，疫情給高等教育國際化帶來的後果和混亂已不可避免，而且隨著疫情的發展影響會更加嚴重」^⑦。在此情況之下，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需要突破空間和人員流動的物理限制，利用現有國際化資源存量，開拓國際學術交流新形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模式得到進一步發展^⑧。

(一) 後疫情時期中國在地國際化的發展

在學生跨境交流受到限制的情況之下，地域界限讓國內高校必須基於「本土」資源，來開展國際化實踐，探索如何在「本土」地域內培養國際化人才。在現實需求推動下，中國「在地國際化」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在課程設計、學術合作、教育技術、評估體系等方面形成了更規範的架構。

在課程設計方面，國際化課程從語言形式的國際化向教學內容的國際化過渡。「是否使用母語授課」不再作為評定該課程國際化指標的主要標準，使用外文授課並不代表其國際化程度高，而中文授課也並不代表「本土化」程度高。高校建設國際化課程的理念更加注重教學內容的國際化，課程的語言形式作為外在框架可以多元化，但課程內容必須體現國際化特征。所謂課程內容國際化，就是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學生可以初步了解全世界範圍內或者境外某一範圍的文化特性、人文情懷以及內在發展情況，拓展自身視野的同時在對比中實現知識互補。如浙江師範大學開設的《非洲教育專題研究》便是採取中文授課的模式，該課程的設置並不是以提高學生語言能力為目的，而是注重培養學生的國際素養，讓學生不必前往非洲，便可以通過非洲視野對非洲教育發展情況進行深入了解^⑨。

在學術合作方面，國內高校進一步挖掘中外合作辦學潛力，計劃將其打造為「不出國門的留學」。疫情時期，中外合作辦學相較於其他涉外合作模式，有相對獨立的教學場所、良好的辦學環境以及更優質的師資力量，因而在規模、層次和模式上都得到迅速發展。截至 2020 年 8 月，我國所擁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數量已近 2000 個^⑩，這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資源，為「在地國際化」擴充了除普通高等教育教學外的其他參與途徑。

在教育技術方面，互聯網技術與教學的結合得到極快發展，「數智教育」模式逐漸成型。疫情催生了線上教學模式的興起，如錄播、直播、慕課 (MOOC) 等形式。課堂實現了時間、空間的雙重突破，教學資源較程度上開放給了大部分學生，學生甚至可以線上完成科研報告、課程作業。「在線課程」將不再被視為傳統課堂的附屬產品或面授教學的低效模仿品，而將作為高等教育的獨特產品和重要分支^⑪。在互聯網技術支持下，國內外高校協同召開學術會議、學術講座的難度降低，線上圖書館、線上資源庫等教學資源加速共享，為加強學生的國際化素養和科研能力提供了更豐富的教學資源。

在評估體系方面，教學評估逐漸向「結果取向」(outcomes assessment) 型評估轉型。高校對學生國際化的評估從「重結果輕過程」的量化評估為主，開始向「過程、結果兼備」的綜合性評估的方向轉變，以浙江師範



大學為例,其國際化評價主要指標從量化的師生跨境交流數量轉變成了是否參與高質量國際化課程²⁰。結合線上教學模式,國際化課程學分製也更加多元化,學生不僅僅是通過考試而是研究報告、展示等多種方式來進行評價,更能反映學生的國際化素養。

(二) 後疫情時期中國在地國際化的挑戰

中國在地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依然面臨著諸多挑戰。中國自身作為世界上高等教育規模最為龐大的國家,仍處於高等教育知識圈層中的「巨大邊緣」(Gigantic Periphery),其發展質量水平仍不足以進入知識中心。能否普及在地國際化模式存在著疑問,目前仍然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問題有待解決。

教育技術豐富了「在地國際化」形式,與此同時也加劇了地域間高等教育的不平衡。中國各省份之間的數字能力、科研資源存在較大的數字鴻溝與智能代差,雖然互聯網技術對用戶自身是平等的,但經濟發展與開放性思維之間的差距導致用戶對互聯網技術的理解有所不同,致使優者愈優、劣者愈劣。東部地區信息化程度較高,「在地國際化」在東部發達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落後。阿特巴赫明確指出,「疫情帶來的「線上課程」,深化了學習者、高等院校和國家之間的差距和不平等,最貧困地區的大學受到的影響更加嚴重」²¹。地域間的「在地國際化」能力不平等,給「教育公平」難題帶來了更大挑戰。

中國高等教育對外吸引力不足,外國留學生、學者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在地國際化」氛圍多元化有待提升。不可否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已經得到長足發展,2020-2021年,來華留學學歷生占比大幅提升,達到76%²²。但高校在與國際知名院校建立合作關係時,會更多傾向於和鄰近國家(韓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非洲國家)建立交流合作關係,較多高校對留學生與本土學生實施「區別管理」,人為地在留學生和本土學生間設置了障礙²³。中國留學生結構仍處於一個緩慢優化的階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化氛圍在校園內的推進。中國仍需要進一步發揮「雙一流大學」的品牌效應,擴大整體的國際吸引力,實現國際化人才的均衡出入。

中國缺少對「在地國際化」的綱領性政策支撐,當「跨境國際化」限制減少之後,中國在地國際化發展可能會受到較大沖擊。中國在「跨境國際化」方面已經頒布《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辦法》等綱領性政策文件,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跨境運行體系,指引著對外交流由「量」到「質」的轉變。然而,在「在地國際化」方面,尚沒有綱領性政策為其進行頂層設計,缺少自上而下的運行機製。當疫情結束、國際形勢緩和之後,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仍可能重新偏向跨境交流而非「跨境國際化」與「在地國際化」並行。

四、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優化建議

在後疫情時代,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全面發展趨勢的增強,高等教育需要正視國際化進程的挑戰,探索符合現實發展需要的國際化路徑,以「實現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²⁴的戰略目標。「在地國際化」作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路徑,在現實課程教學中依然存在各種問題,高校與政府機構仍需依托自身發展基礎、借鑒國外優秀經驗,在建設高質量國際化課程和完善「在地國際化」落地配套機製方面加大力度,開拓具備中國特色的在地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

高校作為在國家競爭力體系中起著核心作用的主力軍²⁵,需要建立基於科學理論的系統化國際化課程

體系,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教學質量。各高校首先應深化「高等教育國際化」概念理解,把握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前提是基於全球化的教育理念來看到教育發展問題^②,英語化程度、國際流動的師生數量並不是評判國際化程度的硬性指標。實際上,在地國際化的實施是一個非同質化的復雜過程,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院校都會存在對在地國際化的不同理解和闡釋^③,各高校應從師資力量、學生水平、所在地區需求等客觀情況出發對自身的國際化發展目標進行針對性思考,從實際出發構建具有校本化特色的國際化課程,而不是一味照搬外國經驗。就課程內容而言,國外學者卡蘭(H. Callen)認為理想化的國際化課程既需要相應的外語課程,也需要融入不同類型的文化內容和對學生跨文化認知、多文化溝通技巧的訓練^④。這表明在地國際化課程需要採取多元化的開放式教學模式,讓學生接觸國際多元文化中的各類元素,尋找外語學習和國際化素質培養間的平衡點,兼顧被動的知識接受與主動的知識獲取,促進學生通過自我學習和完善來習得國際化素養。此外,國內國際化課程建設存在碎片化特征^⑤,零散分布或特定數量的課程弱化了國際化課程的教學效果,亟待高校改進頂層設計,將國際化課程體系化,開展全學科、跨學科導向的課程國際化整體統籌設計,在地國際化的成功實施需要高校各個部門的每個成員積極參與^⑥。

即使「在地國際化」在疫情時期得到了一定發展,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模式對於我國而言尚為新興事物,仍然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科學配套機製以推動其落地。政府需要為高校實施在地國際化提供合理的政策保障、規範的製度支持,例如出臺確保法律法規以保障在校學生享有接受在地國際化的權利、適當予以高校協調本地國際化教育資源的權利、提供專門的在地國際化財政支持體系等。部分學者認為,由於現有高等教育體製管理限製、公共政策導向模糊,高校缺乏對在地國際化戰略的推進意願^⑦,從而阻礙其發展。對此,中國可以借鑒印度、瑞士等優秀經驗,將「在地國際化」寫入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為「在地國際化」提供宏觀政策上的支持,逐漸破除傳統高等教育的管理機製限製,建設以服務為本的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推行機製。為進一步推進「在地國際化」這一國際學術協作新模式,政府還應依托「一帶一路」建設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在後疫情時期牢牢抓住「一帶一路」建設中與鄰國的教育援助與教育合作的互補互惠關係,加速構建國際教育組織深度合作關係,進一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話語權與影響力,深度參與國際教育規則製定,打造高等教育國際化對外開放大格局以營造更適宜「在地國際化」開展的教育環境。

五、結語

「在地國際化」的出現與興起,不僅是由於疫情帶來的跨境國際化受阻,也是探索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化未來發展的新方向:基於「本土」的國際化。國際化並不是一個同化、西化的過程,各國應結合自身本土教育特點走向世界。中國在傳統的跨境國際化模式中始終面臨著如何在「西化」中保持自我的難題,而在地國際化則在本土地域提供了一個批判性吸收外來知識與文化的方式,為中國尋找「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平衡點帶來了全新範式,也會培養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人才提供了可能。

雖然以疫情為主的外部因素助推了「在地國際化」技術層面的迅速發展,但中國國內高等教育資源、教育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處於落後地位。雖然「在地國際化」與「跨境國際化」並行的國際化模式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新潮流,帶來了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新模式,但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與挫折同樣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仍需立足自身現實,正視不足之處,推動高校國際化課程內涵建設、國際化理念普及以及建立更多世界

一流研究型大學,深入發展在地國際化能力,在全球知識圈中占據主動地位。「本土培養國際化人才」道阻且長,推行教學架構上因地製宜、課程內容上多元開放、製度保障上合理規範的「在地國際化」戰略,對中國建設具有本土化的國際意識建構有著豐富的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 ① Knight, J. (2004).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8(1), 5-31.
- ② 張偉,劉寶存:在地國際化: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走向,《大學教育科學》,2017年第3期,頁10-17+120。
- ③ 蔡永蓮:在地國際化:後疫情時代一個亟待深化的研究領域,《教育發展研究》,2021年第3期,頁29-35。
- ④⑤ 仲彥鵬:在地國際化:我國高校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新路向,《山東高等教育》,2019年第1期,頁35-41。
- ⑥ 張彥華:我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課程教學策略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頁98-107。
- ⑦ 李偉,張建偉:我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內涵演進、發展困境及實踐邏輯,《黑龍江高教研究》,2024年第3期,頁26-32。
- ⑧ Wächter, B. (2000).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the context.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A position paper*, 5.
- ⑨ Beelen, J., & Jones, E. (2015). Redefi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Between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olicies*, 59-72.
- ⑩ EU Commission. (2013).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Retrieved June, 11, 2013.
- ⑪ Sursock, A. (2015). Trends: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 ⑫ 陳興德,王翠娥:教育依附論的理論圖景——以卡諾伊與阿爾特巴赫為中心,《外國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頁6-11。
- ⑬ 王建梁,楊陽:在地國際化:印度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最新戰略,《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頁36-46。
- ⑭⑮ 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2015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 ⑯ Marinoni, G., Van't Land, H., & Jensen, T.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hig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AU global survey report*, 23(1), 1-17.
- ⑰ ALTBACH P G, DE WIT H. COVID-19: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revolution that isn't. (2020-03-14).
- ⑱ 張應強,薑遠謀:後疫情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向何處去,《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12期,頁1-9。
- ⑲⑳ 毛錫龍,楊凱:後疫情時代中國地方高校在地國際化的探索——基於浙江師範大學的實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頁111-120。
- ㉑ 鄭金梁:後疫情時代高校國際交流面臨的挑戰. <http://art.ifeng.com/2020/0827/3506599.shtml>.
- ㉒ 周嶽峰:新冠肺炎疫情給高等教育國際化帶來的影響,《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第5期,頁13-15。
- ㉓ 菲利普·G·阿特巴赫,漢斯·德維特,周嶽峰:展望後疫情時代全球高等教育發展,《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版,頁33-35。
- ㉔ 教育這十年「1+1」系列發布會第十三場: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教育國際合作交流情況。(2022-09-20)
- ㉕ 任友群:「雙一流」戰略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未來發展,《中國高等教育》,2016年第5期,頁15-17。
- ㉖ 馬德秀:《變革與超越:走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之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16。
- ㉗ 文東茅,陸驕,王友航:出國學習還是校本國際化?——大學生國際化素質培養的戰略選擇,《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0年第1期,頁17-26。
- ㉘ Hilary, C. (2000).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5(1): 15-22.
- ㉙ 房欲飛:「在地國際化」之「舊」與「新」:學理思考及啟示,《江蘇高教》,2021年第8期,頁41-45。

- ③① Beelen, J. (Ed.). (2007).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EAI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③② Anneke Luijten-Lub (2005).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Europe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onn: Lemmens, 239.
- ③③ Devin Grace O'sullivan, GAO Yufang & GUO Zhengrong. (2021). Li Ziqi: Internet Idol 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1, 3, 040-047.
- ③④ 許鈞:《翻譯與現代漢語建設》,《英語研究》,2023年第1期,頁12-20。
- ③⑤ 劉彥仕:「和而不同」:《中國經典書論術語的英譯比較——以〈書譜〉的三個中譯本為例》,《外國語文》,2018年第3期,頁128-135。

(Editors: JIANG Qing & Joe ZHANG)